

· 学术视野 ·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变迁^{*}

孙 灿

[摘 要] 中国的对外援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这既非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更非转向了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援助革命”理念相生相伴。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在“援助发展”理念中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新中国成立到对外开放，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历程体现了援外理念从“援助革命”向“援助发展”的转变，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地位确立和内涵调整。新时代，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推动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彰显“胸怀天下”的崇高追求，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 中国对外援助 援助革命 援助发展 胸怀天下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在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思想，对外援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胸怀天下，持续援外”所取得的成就乃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丰硕成果。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实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既非狭隘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又明显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深入理解该思想在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历史表达有助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与时俱进的品质，坚定“胸怀天下”的信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对外援助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从源流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首先体现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即“全世

^{*}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国际主义思想视域下中国援外与发展合作的历史变迁研究”（QN2310）的阶段性生活成果。本文初稿曾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江苏青年政治学论坛”上宣读。感谢钮维敢、毛维准等学者对本文的指导和建设。

界无产阶级为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实现共同目的而联合奋斗的思想观点”^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与资本主义扩张和世界市场建立密切相关。资本超越国界流动使得无产阶级不仅饱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且受到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剥削。这决定了各国工人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支援才能获得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援助革命”的理念。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当代内涵已超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的范畴^②。不过，对外援助的视角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关键，只是如今的援助主题已从“革命”转向了“发展”。

（一）“援助革命”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

英国学者弗·哈利迪（Fred Halliday）曾经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一书中认为，“国际主义”一词在1864年由于第一国际的建立而被引入政治论述，并被描述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区别于其他自由主义及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变体^③。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起就已经在一系列演说和著述中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并赞同工人阶级援助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

1847年11月29日，在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关于波兰的演说》，指出“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④。由此，国际主义的价值追求被认为是各国工人阶级基于相同利益和面对相同敌人而进行合作的思想理念和联合行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⑤的国际主义呐喊，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⑥。《共产党宣言》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得以更加全面、系统和清晰地呈现：不仅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阐释了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基础，而且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为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其为国际主义思想的实现指明了路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去挣脱被束缚的“锁链”。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无产阶级联合的本质就体现在对外援助中。1871年9—10月，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起草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表示：“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得到加入协会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⑦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身体力行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援助就是鲜活的例证。从1871年开始，他们就在经济生活和思想政治等方面对公社流亡者进行持续性援助，而这项伟大

① 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206页。

② 尹占文：《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③ 参见〔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68—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的援助事业也几乎贯穿于他们接下来的整个人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看来，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和对抗中必须铭记自己的革命路线，国际主义思想是积极抵制统治阶级压迫和侵略政策的力量，“援助革命”的理念和实践使这股力量得以凝结，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依托国际同胞的相互支持和广泛参与。

（二）“援助革命”的发展：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列宁看来，民族解放问题已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20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哈利迪看来，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开始适用于几个独特的问题——革命政党的国际政策、某个具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对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以及对俄国及其他国家内部的种族关系的处理^①。反对民族压迫与隔离，强调民族联合与团结成为国际主义原则在实践中的重要发展。

1920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其中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② 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不仅包含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而且包含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因此，把“民族自决”原则融入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就成为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不过，在权衡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时，列宁倾向于认为前者具有优先级位置。因此，他表示不能以民族自治文化取代国际主义文化，后者本质上是要构建一个各民族工人团结互助、包容一致的新世界，进而达到与真正民族自由的统一。当然，这样的国际主义文化场景不会自动实现，它既需要有共同的组织保障，又需要有反抗旧世界民族压迫与有效斗争的能力保障。

国际主义思想中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更离不开对外援助。列宁在1917年4月10日写作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清楚地表明：“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③ 足见对外援助在列宁国际主义思想中的分量。在实践中，列宁意识到俄国革命之前途与世界革命之前景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俄国革命的破晓有助于唤醒和激发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成功也离不开世界其他地区革命力量的援助和革命浪潮的激荡。秉持世界革命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理念，列宁领导并推动了共产国际的成立。正是从其成立开始，革命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

① 参见〔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日益升温,突出表现就是成员党组织逐渐承担起相互援助的正式义务。尽管列宁对“援助革命”抱有迫切期待,但也坚持认为对外援助应该量力而行,并将“即使可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①的观点视为奇谈和怪论。而在争取援助的对象上,列宁也认可来自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支持是首要和最根本的。

(三)“援助革命”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具有生命力的”,这是1964年10月22日,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的。多伊彻的发言立足于“三个国际”之历史作用和成败。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族主义在一个国际中越来越得逞,就势必压垮和埋葬那个国际,或者肆无忌惮地践踏它”,这是“三个国际”之共同命运。然而,“国际主义思想比几个相继成立、兴旺但随即衰落并死亡的国际更重要、更符合需要、更富有生命力”^②。尽管多伊彻极富创见地提出了关于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价值命题,却在近乎完全对立的关系中评判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忽视了二者的统一性。

1893年6月20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曾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③由此可见,虽然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却并未因对国际主义的追求而彻底否定民族主义。相反,其主张工人阶级不应漠视民族问题,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国际主义进程中的进步阶段。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发展既包含了对被压迫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肯定,又包含了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承认民族自决”是列宁民族主义观的核心,他坚持认为国际主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民族自决的国际联合基础之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对民族主义思想的选择性接纳和有机结合恰恰是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充分展现了国际主义思想的包容性品格。

变换的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命力提出了新考验,对外援助以一种“承认的政治”形式超越“援助革命”理念,成为沟通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纽带。虽然国际主义思想诞生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但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来临后,人类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面对共同敌人、为了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联合奋斗的场景仍然时常被见证。这充分说明,国际主义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只不过其已经突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的范畴,迈向一种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思想建构^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关切认同和尊重的外部性愈发明显,其与独立自主、拒绝干涉的内向性一道构成了该思想的“双螺旋”结构。这种外部性被学界称为“承认的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民族主义思想存续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4页。

② [波兰]艾萨克·多伊彻:《国际和国际主义(196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张莘摘译,《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4页。

④ 参见尹占文:《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的原因^①。“承认的政治”意味着民族国家需要将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联结，这使得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结合具备了更多可能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外援助可以被视为一种“承认的政治”形式，它承认的是援助主体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承认的是它们团结谋发展的共同需求。因此，超越理想情愫的“援助革命”，在现实情境的“援助发展”中继续前行是国际主义思想生命力的延续。

二、对外援助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倾向于克己助人地支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先进武器送弟兄”和“勒紧裤带帮朋友”是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生动反映，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完成各自的革命任务，书写了“援助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开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格局的深刻变迁，和平与发展日渐成为世界政治叙事的中心议题。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加关照自身实力、强调实事求是，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书写了“援助发展”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调整。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旨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发展成果的共赢共享。秉持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导向，中国对外援助更加关注实际发展成效和受援国的民生改善，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授人以渔”和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书写了“发展合作”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篇章。

（一）“援助革命”的坚守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确立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朝鲜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的援助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援助革命”性质，不仅包含对外军事援助，而且包含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抗美援朝中，中国派出志愿军直接参与军事作战，并向朝鲜无偿提供大量战争急需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最终结束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为进一步援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内再拨款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朝鲜政府^②。中国对朝援助“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体现了“克己助人”的风格。援越抗法中，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武器装备和帮助训练越军主力部队，同时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全面协助越南军队组织指挥作战。战争结束后，为帮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赠送8亿元人民币给越南政府^③。从1956年开始，以援助柬埔寨民族工业和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为契机，中国政府开始陆续向一些亚非民族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对外援助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发展。自1964年中国宣布

① 参见梁雪村：《“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

③ 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27页。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受援国数量、援助金额和成套项目比重等方面均有了大幅提升。援越抗美是这一时期对外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战争期间，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帮助越军培训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协助越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歼击机团，还陆续派出部队到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和国防工程建设及海上扫雷等任务^①。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历史起步于“援助革命”的主题实践，与此相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地位确立，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解主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互助。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革命联系的历史延续，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坚定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选择的思想映射。抗美援朝可谓是新中国国际主义实践最生动的表达，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② 20世纪50年代后，冷战背景下第三世界的联合与抗争风起云涌，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际主义思想的运用不应只包含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还应反映广大民族独立国家反帝斗争的图景。万隆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包含“两种力量团结”的国际主义，即一方面要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要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③。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④ 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主义思想内涵在中国语境下历经变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乃植根于“世界革命”的时代浪潮中。1970年11月13日，周恩来同志在同巴基斯坦总统的会谈中明确了中国对“革命”的理解，“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⑤。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确立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包含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话语建构中，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并行不悖、彼此融合的。换言之，爱国主义对现实政治的目标追求被置于国际主义的理想政治秩序之中。正因如此，每每谈及国际主义性质的抗美援朝时，也总是与爱国主义性质的保家卫国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确立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形式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演进，目标也经历了从联合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援助革命”就是为了争取中间力量构筑国际统一战线。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融合为国际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以共同目标为指向，团结大多数与求

① 参见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③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8页。

⑤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67页。

同存异相结合为国际统一战线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援助发展”的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调整

“援助革命”理念下的对外援助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希望在援助国和受援国互惠发展的轨道上开启“援助发展”新征程。“援助发展”转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缩减援助量、扩大援助面。仅1979年至1985年这7年间，中国对外援助在严控支出的基础上新增了19个受援国。不仅包括了菲律宾、安哥拉这样的亚非传统援助对象，而且包括了哥伦比亚、斐济这样的拉美和南太平洋岛国等新兴援助对象^①。另外，中国的物资援助进一步减少，成套项目的援建日益增加，且更为注重项目服务中“授人以渔”的能力培育。“援助发展”转向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丰富援助形式、扩展援助效益。在市场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援助与企业合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形式不断融合，具备了更好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援助在“大经贸”战略的指引下迎来新的变革。“援助发展”的转向突出表现为援助方式的调整——对外援助中的贴息优惠贷款迅速增长，企业逐步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援助合作的主体。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援助发展”的指向性越来越清晰，机制化程度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约2/3的对外援助资源被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在2011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建立旨在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该组织的“中国项目”，系统且有针对性地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能力援助。另一方面，以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为标杆，中国先后与东盟、中亚、拉美和加勒比、太平洋群岛及中东欧国家通过地区组织或经济论坛等形式进一步夯实对外援助基础，形成援外的机制网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外援助历史转向“援助发展”的主题实践，与此相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调整，首先呈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中。邓小平同志对国际主义的思想认知具有鲜明的“发展问题”转向。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②国家发展是推动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国际主义价值的实践需要尊重和保障国家利益。因此，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现在正在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对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多尽点力量。”^③在强调国家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中彰显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调整，也是新形势下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生动表现。建立国际新秩序是解决国际主义思想“发展问题”转向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国际新秩序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经济方面是先导议程，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民族经济权益的维护。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对当前仍遭受新

①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3-7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5页。

殖民主义之害（包括受到自然资源控制和经济利益攫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国际主义思想以公正发展为载体的一种务实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在一种更具发展导向性的对外援助改革中稳步前行。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续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品格与精神，将“援助发展”的理念转向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江泽民同志赋予国际统一战线新的时代内涵：“这个统一战线，要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它不是由谁出面组织的，而是在一定的国际场合、针对一定的问题自然形成的一种联合行动。”^①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质上就是一种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发展中国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力量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经济新秩序的国际主义联合行动。胡锦涛同志首倡的和谐世界理念是21世纪的国际主义宣言，和谐世界秉持科学发展的要求，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中推动世界的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为此，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更加强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不断探索利用金砖合作等新的“援助发展”机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

（三）“援助发展”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

“援助发展”的转向为中国矢志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明确应“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③，不断深化这种理念，继续坚守这条道路。“援助发展”深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发展经验为载体的知识分享频繁呈现于援外实践过程中。在工业领域，中国为白俄罗斯实施工业园政策保障技术援助项目，同白俄罗斯分享中国开发区发展模式和经验；在农业领域，中国在汤加、萨摩亚等国推广沼气技术和“猪－沼－菜”循环农业生产技术，分享农业综合经营经验；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国在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村级社区示范“整村推进”等减贫经验，强化村级组织能力建设^④。作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智力支柱，知识分享直接指向受援国的能力建设。“援助发展”深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外援助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2015年，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转型意味着可持续性方案逐渐成为发展议题的主导方向。中国正结合全球发展形势，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持续完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和机制。近年来持续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表明对外援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加大促进发展的各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48页。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日报》2021年1月11日。

类资源投入，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提出了新挑战，也促使中国更加重视民生援助，推动“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简称“小而美”项目）的优先开展。为加大对全球发展的资源投入，中国政府成立了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重点投向农业、减贫、卫生、环境等领域的“小而美”项目。中国公布的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中就有不少这类务实合作项目。相比大型成套项目，“小而美”项目具有风险小、效率高、收益好等优势，且可以为当地民众获得感和认同感的形成带去实实在在的成果，有利于提升发展的普惠性。如今，以青蒿素和菌草技术为代表的“小而美”项目已经成为中国援外事业的亮丽名片和扶贫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历程是对“援助发展”主题实践的深化，与此相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实践，集中反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理念中系统思考了全球发展的未来方向，饱含了国际主义思想的时代意蕴。他强调，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面对挑战，“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中促进全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推进。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②，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肯定了世界文明多样性，又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国际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又是一种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强调国家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及在利益共享中实现国家利益的互利共赢，责任共同体强调国家应尽的合理义务及在责任共担中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结合与升华，是国际主义思想以有效发展和有为发展为共同载体的一种进阶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在义利兼顾和弘义融利的对外援助转型中开拓创新。

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国际发展的主流理念有效对接，推动对外援助向发展合作转型升级。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合作渠道上的转型，即从政府间主渠道的双边援助转向多元化的援助主体和多边参与的交互式合作；第二，合作方式上的转型，即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深度对接受援国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互补与发展互利；第三，合作类型上的转型，即发挥成套项目的传统优势，更加注重“小而美”项目，做到大小项目平衡推进和软硬援助相互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导向，强调开放发展与互利共赢，生动诠释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哲理——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①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6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1页。

文化的弘扬，也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①。“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为核心，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实践平台。当前，“一带一路”正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提供新机遇，在“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层面加快援外资源的整合和系统化，不断谱写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合作的新篇章。

三、中国援外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

美国知名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思想根基，中国的对外援助历程既生动诠释又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动力和借鉴。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援外的价值融入

中国对外援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如下两个重要事实是需要澄清和辨明的：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不止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将中国对外援助的思想根基仅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是不全面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时代变化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民族发展相关的国际主义思想凸显了出来，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其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思想根基发轫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前行，绝非转向了西方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轨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是基于国家相似性的援助假定，从霸权地位和相对收益的角度出发将西式民主扩展作为援助目标，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援助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则是基于国家多元性的援助假定，从平等地位和绝对收益的角度出发将各国的普惠发展作为援助目标，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援助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在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科学思想，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其品格是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其内涵是在具体的时代和环境条件下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援外实践倾向于克己助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予以充分支援，对外援助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以“援助革命”为主题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得以确立，融入了关于爱国主义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维度思考。改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日报》2021年1月11日。

② 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 4.

③ 尹占文：《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探索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并日益借重市场经济的力量参与其中，注重实效。以“援助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逐渐形成，融入了有关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价值维度的思考。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加注重战略统筹、平台统筹与新的合作模式和伙伴关系的拓展，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以“援助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走向深入，融入了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的价值维度的思考。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是一个价值关切持续融入的过程，由此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增加了其历史厚度。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援外的关系共生

中国对外援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如下两项重要引申也是需要明晰和洞察的：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不是一种“悬置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在场性”的知识。所谓“在场性”知识，是指在直面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基于行为体自身实践经验累积和理论建构所形成的知识。“在场性”知识的反面就是“悬置性”知识，往往指既不是原生的，也不是基于行为体实践经验而得来的想象或迁移的知识^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在场性”表明它既是特定时代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的真实写照，又是身处其中的国家直面现实挑战和奋斗目标的经验书写。对外援助作为连接国内发展经验和全球发展需要的纽带，是这种“在场性”知识生成的有效途径。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不是固定和僵化的教条框架，而是流动和共生的知识建构。固定和僵化的教条框架意味着知识产生的条件被设定了边界，知识的加工是封闭的，知识的价值适用是有限的。流动和共生的知识建构刚好相反，意味着知识产生的条件不设边界，知识的加工是开放的，知识的价值适用是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流动性和共生性表明它具备在不同时代进行知识参与、累积和共享的可能，并且其所包含的思想价值具备在各国间传递的条件。对外援助作为连接国内发展经验和全球发展需要的纽带，是这种流动和共生的知识建构的有效载体。

中国对外援助历程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不仅是一种知识汲取和创新，而且还是一种知识分享，特别体现在援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上。“在场性”的知识结构意味着中国对外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平行经验分享”，即强调“援助实践中所基于的知识体系是源于援助方自身发展历程之上的、未经系统构建的，也并不对受援方的发展路径提供严格的约束，而是为其提供参考”^②。中国对外援助直接作用于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与西方要求进行制度变革和接受附加条件的“捆绑援助”有着本质区别。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追求独立自主既是共同的政治底色，又是共同的现实期盼。中国对外援助致力于通过知识分享扎根当地，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增强受援国的自主“造血”能力。流动和共生的知识建构意味着中国对外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是一种知识的互构过程，即中

① 参见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2期（下）。

②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

国的援外知识要与受援国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形成对原有知识的一种反馈和改进机制，这与西方援助知识单向度输出和生搬硬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流动和共生的知识建构指向更深层次的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凸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新型伙伴关系。这种援助关系对各国交往和联系的丰富也彰显了变化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新进展。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是一个本土知识平行分享和相互分享的过程，由此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拓宽了其经验广度。

总之，从“援助革命”到“援助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本质。对外援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时光透镜，从“援助革命”到“援助发展”，对外援助呈现的是国际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援外，展现大国责任担当。过去，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道路，推动援外实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发展是第一要务”转变。如今，中国以“加强顶层设计”的智慧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方案，在援外资源的“精准投放”中推动全球发展迈向高质量进程。70 多年的中国对外援助历程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意蕴。在关照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既有助于促进本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又有助于推动全体人类的进步事业。

（孙灿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孙应帅]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专业网络学术传播机构（如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